

# 本土化与新媒介语境下的人际传播研究

## ——第三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综述

谢明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5.03.008

2014年10月27日,第三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是:“跨学科视角:新媒介语境下的人际传播研究”。这次论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集并筹备,受到中国传播学会资助,以第十二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分论坛的形式召开的。

2010年10月23日,得到中国传播学会的大力支持,中国传播学会人际传播专业委员会在南京大学创立。目前,该委员会有来自全国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事单位十五家,常务理事单位代表8人。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行为的基础,主要发生在个人、群体、社会、文化的各种关系交往层面。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手机等数字化的社交新媒体的兴盛,新媒介环境下的人际传播对中国社会变革、人际交往关系的建造和人的社会心理影响越来越重要。新媒介大大提高了社会个人参与公共政策、经济、文化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包括个人在家庭、婚姻、社交、商圈、职场、种族、国家等不同关系层面和社交网络中对各种交往讯息的传播与关系意义的建构等。新媒介语境下的人际沟通现象很值得来自不同研究领域、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者给予关注。因此,本次论坛倡导以跨学科研讨的方式,汇集重要的研究成果,揭示新媒介对人际沟通现象、人际沟通方式与人际交往关系进行重新排序的社会影响,探讨人际沟通研究的新方法或新途径。

###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与思考

我国的人际传播研究基本承袭了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框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开始对西方人际传播思想和理论进行引介,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回顾和追踪,一方面为我国的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对我国本土化的人际传播研究也具有

---

作者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定的借鉴作用。近年来,随着人际传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性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的社会现象和现实,进行人际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与思考。

南京大学的翟学伟教授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致力于中国人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关系研究。翟教授在论坛上的主题发言,基于其多年来的主要研究对象——“关系”(翟教授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围绕“中国人的社会信任模式”,通过对中国传统的“五伦”进行分类研究,提出了与西方社会二元对立的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模式不同,中国人的信任模式存在着“放心关系——信任关系——无信任可言”的渐进式信任模式。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偏向。由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以往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争议和困惑,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翟学伟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原有的人际交往模式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和交往规则正在形成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有意思有价值的社会现象,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人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等,值得学者们去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关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翟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和现象建构成理论和模型。先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出发,再回推看儒学经典文本对这些现象的阐释。也就是说,在儒学经典和中国人的行为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可能是家庭或者社会,把儒学经典里的行为规范潜移默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之中。

## 二、学科发展现状与比较研究

与翟学伟教授完全立足于本土化视角的研

究不同,复旦大学的胡春阳教授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通过中国和美国的比较,阐述了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进行人际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基于本土化探索的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当代中国,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交织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的现实问题和人际关系的困境,例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需要却找不到解决途径。因此胡春阳教授认为,中国的人际传播研究学者,可以效法西方相关领域的研究主题,在关注宏观的社会和谐等问题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普通人的人际关系研究,着眼于中国人际传播的话语特点和冲突解决模式。

在梳理了西方的人际传播研究发展历程之后,胡春阳教授提出,西方人际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走上学科化道路,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历程还很短暂,人际传播的发展之路正在脚下。当今中国,“人际传播知识似乎又在被海量生产出来,比比皆是,‘心灵鸡汤’恶补着我们人际传播知识的饥渴。”在中国进行人际传播研究,绕不开的是中国独特的伦常关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五伦,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模式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释放中国人人际压力的现实性,都值得大家去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上海大学的沈荟回顾了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际传播领域经历的巨大变化,从小群体传播到互联网在在带来的社交孤独和隔离上所扮演的角色。她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新媒体”和“人际传播”为关键词,对三大期刊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广播教育学会(Broadcast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和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传播学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从2000年以来的文章进行了检索了内容分析,并从议题选择、理论选择和方法选择三个方面,分析了人际传播领域的发展变化。她认为,具体到研究方法方面,人际传

播需要借鉴中国学人“科玄论战”的精神,实现意义与科学精神的相互交涉。人际传播研究必须立足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一切认识、题旨和问题意识应当从本土社会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以此寻找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

北京交通大学陈静茜的《医患互动中的药物认知研究》是个案研究。近年来,医患冲突成为社会热点,也成为新闻传播学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既有研究表明,药物使用很容易作为客观证据,成为医患纠纷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关注药物治疗的研究有限,既有研究往往关注上升到大众媒介议程中的热点医患事件,但从符号互动论角度对医患之间基于药品使用的微观心理互动过程的研究尤为匮乏——而医患之间的微观互动研究已成为国外健康传播的热点之一。药物治疗不仅存在于私人的意识形态中,也存在于公共的、社会结构的框架之中。陈静茜将药物治疗作为“一种互动的社会文化进程”,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法等方法,对北京海淀区的三甲医院(中关村医院)、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内科及风湿免疫科等需要病人长期服药的科室进行了考察。

中国传媒大学解庆锋做的同样是个案研究,他以新疆南疆高校各民族大学生为例,分析地域性的信息传播形态与内容影响到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教育形态。他认为,人际传播形态在新疆南疆高校具体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设置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南疆高校各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途径与主体特色鲜明。

### 三、新媒体语境下的人际传播研究

新媒体的普及与迅猛发展,给人际传播带来了新的变化和走向。从哲学意义上说,以短信、即时通讯工具、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媒体为媒介

的异地即时传播,实质上是面对面传播的否定之否定形式,既实现了面对面传播的回归,又对其有很大的超越。此次论坛中,许多与会者都围绕新媒体语境下,人际传播的新现象与新趋势,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四川大学张放提交的论文为《媒介化类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应用方向》,他从政务微博拟人化的现象出发,探讨了中介化的人际传播(Media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这一现象。张放总结了媒介化类人际传播的三个特征:依赖于人际传播媒介而存在,传播参与者至少有一方是借助传播媒介呈现的虚拟人,互动过程、机制与人际传播高度类似;并区分了媒介化类人际传播与准社会交往在传播媒介、互动者和互动机制方面的不同。

与张放的研究对象类似,安徽大学研究生凤仙的研究对象是新浪微博@月球车玉兔的拟人化传播,通过进行文本分析,凤仙认为@月球车玉兔的信息传播过程,经历了确立形象——建立线上互动关系——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有效传播这样一个传播过程,并且在受众的反馈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倾向。

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晓静则以微信相册为研究对象,研究多元社会身份在网络平台的实现。经过大量的案例收集和分析,李晓静认为,微信相册“以视觉叙述的方式建立起了亲密关系——社群归属感和参与感,共享同伴文化和集体记忆;以可视化自传的方式构建了自我的社会身份认同——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完成自我意识的重塑和成长的仪式。”

在社会转型期和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夹缝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越来越需要人际传播的知识和引领,现实生活中人际传播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扩展和方法探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际传播研究大有可为。